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路径： 日本的经验与启示^{*}

田 正 武 鹏

内容提要：日本完成工业化进程后，经济的结构性问题日益突出。总需求不足、资本收益率下降和人口老龄化等，导致了日本潜在生产率下降，阻碍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日本于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开始推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旨在促进创新、消除资源错配、改善产业结构，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回顾日本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发展历程，并实施时间序列分析，可验证日本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实施对其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作用。中国可借鉴日本的经验，将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作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政策抓手和主要着力点。

关键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全要素生产率 资源错配 技术创新

作者简介：田正，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武鹏，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

中图分类号：F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7874 (2019) 03-0111-25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战后日本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经验与教训研究”（编号：17CGJ012）。

中国经济在经历 30 多年的高速增长后，逐渐进入了转型调整时期。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背景下，为进一步推动经济动能转换、实现高质量发展，党中央提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一总揽未来中国经济发展和经济工作的主线。鉴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中国经济政策中的重要地位，诸多学者投入这一领域研究中，并取得了一定成果。比如，

* 本文系第一届“日本研究青年学者论坛”优秀论文，作者根据评审专家意见修改后成稿。

肖林从经济学角度系统分析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并探讨了各重要经济体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践,提出了中国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战略路径。^①日本有长期施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政策的实践历史,但针对日本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研究仍然较少。王钢探讨了20世纪70、80年代日本在去产能、经济结构转型方面的经验,任泽平则分析了日本经济结构转型时期相关经济政策实施的经验与教训。^②这些研究成果对于日本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探讨较为分散,尚未清楚梳理日本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措施之间的内在联系。因此,需要回顾和总结日本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所积累的经验与教训,并探究日本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措施的内在逻辑关系,从而为中国当前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有益的参考和借鉴。

一、日本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背景

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日本实现了向工业化经济的转变,日本经济面临的问题从总供给不足转为总需求不足。进入90年代,供给层面的人口老龄化、资本收益率下降等结构性问题日益突出,总需求进一步下降,成为日本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要背景。

日本在实现工业化以后,面临的问题不再是供给能力不足,而是需求不足。经过长期的凯恩斯主义政策实践,日本逐渐认识到提高经济潜在增长能力的重要性,转向实施真正意义上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这一过程中,日本政府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认识有一个由浅入深、不断演进的过程,愈益认识到提高经济潜在增长率的重要性,进而不断调适和完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政策措施。

(一) 后工业化时期日本经济所面临的问题从总供给不足转变为总需求不足

在实现工业化之前,日本经济的总需求旺盛,约束日本经济发展的主要是总供给不足。因此,自二战后至20世纪70年代初期,日本着力实施作用于供给侧的“产业政策”,以具体的产业和企业作为主要的政策调节对象,直

^① 肖林 《新供给经济学: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持续增长》,上海:上海新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

^② 参见王钢 《日本供给侧改革的经验与启示》,《西部金融》2016年第4期;任泽平 《日本供给侧改革的成效与缺憾》,《金融市场研究》2016年第5期。

接实施针对产业和企业的政策干预，促进生产力发展，推动总供给增长，试图在短期内实现日本的工业化进程。

20世纪70年代中期后，日本实现工业化，面临的主要问题从总供给不足转为总需求不足。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开始实施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目的是促进日本经济的总需求增长。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的特点在于国家采用财政、货币等政策手段调节经济供需情况，具有较强的国家调控色彩。为配合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的实施，日本开始推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起初，其国家调控的特征较为明显，可以视为战后及经济高速增长时期所实施的“产业政策”的一种延续，主要是从供给层面入手，着眼于对过剩产能的调整。其后，日本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措施愈加注重激发民营经济主体的活力，侧重于通过经济制度改革，改善经济体制效率，促进技术创新。作为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的一个重要补充，日本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为日本经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

由此可见，日本完成工业化进程后，其经济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从总供给不足转变为总需求不足，实施凯恩斯主义政策不可避免；为配合凯恩斯主义政策的实施，日本推动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就是日本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最主要约束条件。

1971年“尼克松冲击”发生以后，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时期结束，以民间投资为主导的经济增长模式无法持续，日本进入了经济结构的转型与调整时期。20世纪70年代中期至80年代末期，日本年均经济增长率维持在3%至4%之间，相较于高速增长时期的8%—10%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下降。而在宏观经济层面，日本经济所面临的问题不再是总供给不足，总需求不足成为日本经济发展的背景因素。

从具体指标来看，国内生产总值（GDP）缺口是指经济体的总需求与潜在增长率之间的差值，如果GDP缺口为正，说明经济体处于总供给不足、总需求过剩，物价具有上涨的压力；如果GDP缺口为负，则说明经济体处于总供给过剩、总需求不足，此时物价具有下降的压力。通过考察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日本GDP缺口的变化，可以分析日本经济总需求与总供给之间的结构（参见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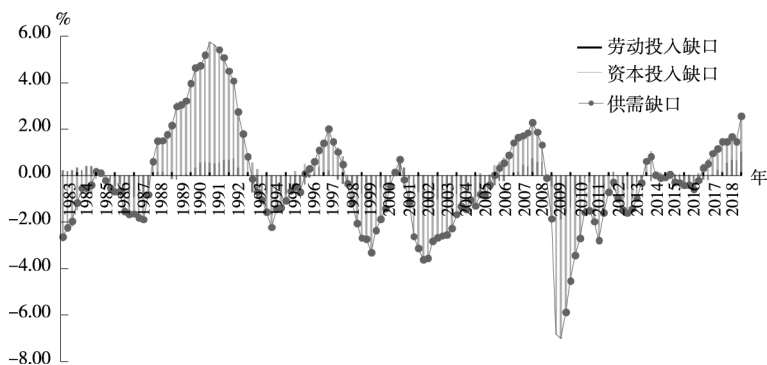


图1 日本的GDP缺口与潜在增长率变化

资料来源: 日本銀行「需給ギャップと潜在成長率」、[https://www.boj.or.jp/research/research_data/gap/index.htm/\[2018-08-15\]](https://www.boj.or.jp/research/research_data/gap/index.htm/[2018-08-15])。

由图1可知, 1983年至2017年, 除了一些特殊的时期^①, 日本经济基本处于总需求不足的状态, 即日本经济的实际增长率低于潜在增长率。如果从更长时段来看, 1960—1975年间, 即日本经济处于高速增长期时, GDP缺口长期为正, 意味着经济体的总需求过剩, 而总供给不足; 但是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 日本经济的供需关系发生了变化, 从总需求过剩转变为总需求不足, 而且这一状态一直持续至今(参见图2)。根据最新的测算结果, 从2016年开始, 日本的GDP缺口终于转为正值, 2018年第四季度达到了2.23%, 但日本经济仍然增长乏力。^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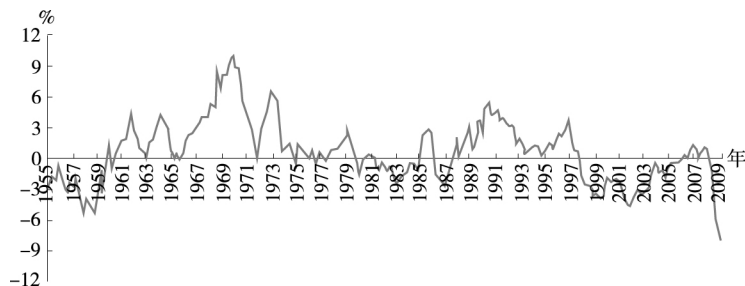


图2 日本GDP缺口的长期变化

资料来源: 村田治「失われた10年の原因は何か—GDPギャップと潜在成長率の観点から—」、『経済学論究』2010年第3号、35—66頁。

① 这些特殊时期包括: 1987—1991年的泡沫经济及崩溃时期, 1995—1996年和2005—2007年等日本经济恢复时期。

② 日本銀行「需給ギャップと潜在成長率」、[https://www.boj.or.jp/research/research_data/gap/index.htm/\[2018-08-15\]](https://www.boj.or.jp/research/research_data/gap/index.htm/[2018-08-15])。

（二）泡沫经济崩溃后日本经济的结构性问题日益突出

泡沫经济崩溃后，日本经济陷入长期低迷，增速不断下降。在 20 世纪 80 年代，日本的经济增长率还大体维持在 3% 至 4% 之间，进入 90 年代后大幅降至 1% 左右。这一状况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源于日本经济的供给结构与需求结构出现错配，总需求不足和有效供给不足的问题长期并存，经济的结构性问题愈加突出。

战后初期以及经济高速增长时期，日本通过实施产业政策，重点促进了钢铁、化学等重化工业的发展。产业政策的实施极大地推动了重化工业的快速发展，形成了卓越的生产能力，使得这些产业具有强大的国际竞争力。日本对美钢铁制品出口从 1960 年的 7168 万美元，增加至 1979 年的 27.4 亿美元，增加了 37.2 倍。^① 如此生产能力的形成与日本政府的政策支持密切相关，这也导致了当产业发展所面临的外部环境发生变化时，其提供的产品与经济的实际需要容易发生脱节，进而出现过剩产能问题。

这种过剩产能并不能为市场手段所消除，从而形成了供给和需求的错配。以小型棒钢的生产为例，1978—1979 年间，日本小型棒钢的生产能力从 1149 万吨提高到 1474 万吨，增长了 325 万吨，与此同时，国内对小型棒钢的需求仅增长了 195 万吨，供需关系出现错配。^② 可见，即便日本是一个市场经济国家，但是在特定的政策条件之下，也会发生供给和需求错配的问题。

归纳起来，日本经济的结构性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资本收益率下降。20 世纪 90 年代后，世界经济进入了信息科学技术快速发展的时代，但是日本受泡沫经济崩溃的影响，信息产业发展滞后，产业结构升级受阻，给经济结构优化造成了负面影响。为了提振经济增长，日本政府开展了大规模的公共投资，但资金基本流向了基础设施建设等回报率偏低的部门，不仅没有促进日本的产业升级，反而使其资本收益率不断下降。如图 3 所示，日本的资本收益率自泡沫经济崩溃后持续下降，仅在 2000 年后表现出微弱的回升态势。资本收益率的下降削弱了民间企业的设备投资意愿，抑制了民间企业的设备投资需求，从而限制了产品产量的增加以及投资推动的物化技术进步，制约了日本经济的持续增长。

^① 小宫隆太郎·奥野正宽·铃木兴太郎『日本の産業政策』、東京大学出版会、1984 年、151 頁。

^② 通产省通商产业政策史编纂委员会《日本通商产业政策史》（第 14 卷），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6 年，第 53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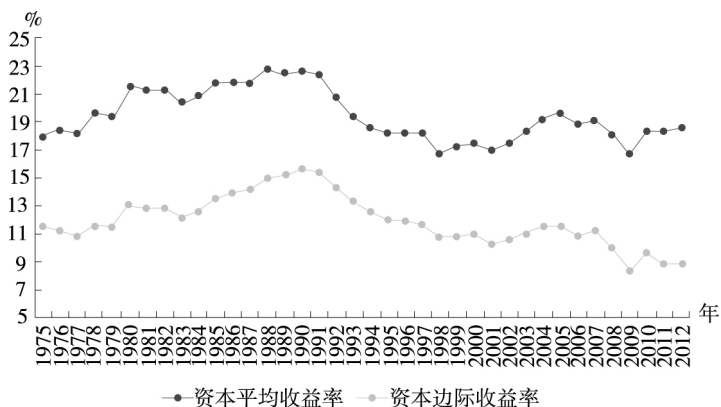


图3 日本资本收益率的变化

资料来源: 宫川努·滝澤美帆·外木好美「資本収益率の低下と無形資産の役割」、
<https://www.rieti.go.jp/publications/nts/16e051.html> [2018-08-09]。

二是人口老龄化问题突出。泡沫经济崩溃后,日本的人口老龄化问题日趋严重,劳动年龄人口不断减少,制约了日本的经济增长。日本国势调查结果显示,2010—2015年间,日本总人口数从1.28亿人降至1.27亿人,降幅为0.7%,其中劳动年龄人口从8000万人降至7700万人,大幅降低了4.8%。^①另据日本国立社会保障与人口问题研究所预测,2020年至2050年,日本的总人口将从1.24亿人降至9700万人,降幅为21.8%,而劳动年龄人口将从7300万人减少至5000万人,降幅达31.9%。^②随着劳动年龄人口的减少,日本的劳动力市场出现越来越严峻的劳动力供给不足问题。厚生劳动省公布的数据显示,2019年2月,日本的企业用人需求和求职人数之比(即有效求人倍率)达到了1.63倍,处于历史高位。^③

三是研发收益率日趋下降。在日本,虽然制造业的研发投入金额持续增加,但反映研究开发资金投入产出效益的研发收益率,自20世纪60年代持续下滑。根据日本“科学技术研究调查”结果显示,日本制造业的研发投入额从1960年的1243.7亿日元,增加到1985年的5.94万亿日元,即使在泡沫

① 総務省統計局『平成27年国勢調査』、2015年、<https://www.stat.go.jp/data/kokusei/2015/> [2019-04-10]。

② 小峰隆夫『日本経済論講義』、日経BP社、2017年、117頁。

③ 厚生労働省「一般職業紹介状況」、<https://www.mhlw.go.jp/content/11602000/000491564.pdf> [2019-03-29]。

经济崩溃后，这一增加的趋势也没有停止，截至 1995 年达到 9.39 万亿日元。^① 但是，日本制造业的研发收益率不断下降。据日本学者渡边千仞测算，日本制造业的研发收益率在 1960—1964 年间曾高达 38.1%，1983—1986 年间下降至 23.8%，泡沫经济崩溃后的 1992—1996 年间进一步降至 17.1%。^② 由此可见，在量的层面上日本制造业的研究开发活动仍然保持增长态势，但从质的层面来看，日本制造业企业将研发成果转化为市场化商品的能力在持续下降。与此相伴的是，日本制造业企业的创新能力持续减弱，提升经济效率的动力愈益不足。

四是资源配置效率下降。在资源配置效率方面，日本经济也出现了严重的问题。包括：（1）泡沫经济崩溃后，日本的金融系统受到重创，银行体系出现“惜贷”现象，致使资金无法流向具有较高生产率的创新型企业，企业生产经营活动中的创新发展受阻。（2）日本式的经营管理方式，如终身雇佣制等，禁锢了劳动力市场的流动性，不利于劳动力资源的优化配置和使用效率提升。简言之，日本的资本和劳动力市场均出现了严重的资源错配问题，生产要素无法流向具有更高生产率的部门和企业，进而阻碍了日本经济的增长。

上述结构性问题的存在，使日本经济的供给结构难以适应国内外经济需求结构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日本经济陷于长期停滞。

（三）生产率持续下降推动日本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日本在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完成工业化后，促进经济增长的动因发生变化，导致其经济的潜在增长率不断下降，特别是泡沫经济崩溃后，日本经济的潜在增长率进一步降低。根据日本银行的测算，在泡沫经济崩溃之前的 1989 年，日本经济的潜在增长率曾达到 4.41%，但是泡沫经济崩溃后，其潜在增长率持续下降，到 2000 年时仅为 1.01%，此后进一步下滑，截至 2017 年仅为 0.85%（参见图 4）。

综上，日本实现工业化后，其经济的供需格局由总需求过剩转为总需求不足，潜在增长率不断下降，令日本政府逐渐认识到提高经济潜在增长率的重要性。泡沫经济崩溃后，日本经济的资本收益率下降，加之人口老龄化问

^① 総務省統計局「科学技術研究調査」、<https://www.stat.go.jp/data/kagaku/kekka/index.html> [2019-04-10]。

^② 榊原清則・辻本将晴「日本企業の研究開発の効率性はなぜ低下したのか」、『経済分析』2004 年第 172 号、80—91 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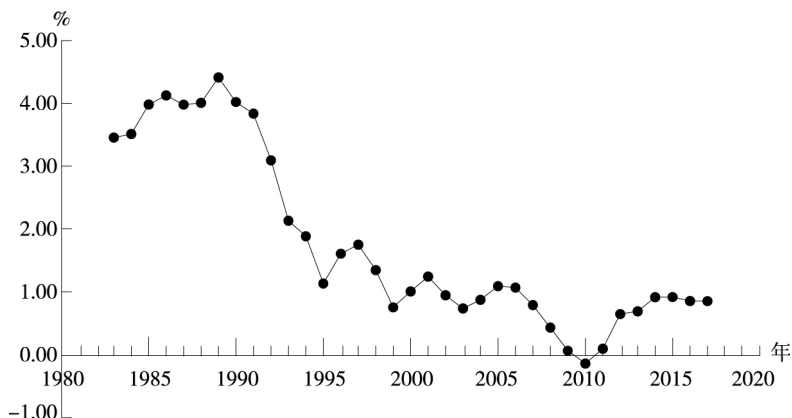


图4 日本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变化

资料来源: 日本銀行「需給ギャップと潜在成長率」、[https://www.boj.or.jp/research/research_data/gap/index.htm/\[2018-08-15\]](https://www.boj.or.jp/research/research_data/gap/index.htm/[2018-08-15])。

题日渐突出, 总需求无法通过传统的凯恩斯主义政策得到提升, 劳动、资本等要素投入不能再像此前一样无限制增加。这些问题的存在促使日本政府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采用提升资源使用效率、促进技术创新等方式提高经济的全要素生产率, 进而提高经济的潜在增长率。

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联系

日本完成工业化后, 经济体的供需关系出现变化, 尤其是泡沫经济崩溃后出现资本收益率下降、人口老龄化加重、研发收益率下降、资源配置效率降低等问题, 促使日本政府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分析日本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需要先厘清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概念与内涵, 探索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 并在梳理日本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发展的基础上, 检验其政策的实施效果。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包含“量”与“质”两方面, 一方面是要推动资本、劳动等生产要素供给, 另一方面是要消除资源配置扭曲、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最终促使供给结构与需求结构相符, 推动经济的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占据重要地位, 尤其是在经济的结构性问题日趋突出的背景下, 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显得十分迫切。

（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内涵

经济学界围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内涵已开展了较为充分的分析和探讨，其中较有代表性的美国供给学派认为，能够从供给层面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如能够推升资本、劳动及全要素生产率的经济政策，就是供给侧政策。^①与此同时，改革开放40年的实践为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的形成提供了深厚土壤。近年来，许多中国经济学者开始探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问题，并形成了“新供给主义经济学”。“新供给主义经济学”认为，中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该从提高供给质量出发，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矫正要素配置扭曲，扩大有效供给，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②

结合美国供给学派以及“新供给主义经济学”的有关理论，本文认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该包括“量”与“质”两个方面。从根本上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目的在于改变供给结构，减少无效供给、增加有效供给，使之符合当前经济的需求结构。就量的角度而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指能够增加资本、劳动等要素供给的有关政策；从质的角度来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指消除阻碍创新、抑制资源流动的制度障碍，改善供给与需求之间的错配，进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有关政策，最终使经济的供给能够适应外部环境的需求，拉动经济增长。

（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是日本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线

受制于基础设施建设存量、移民政策限制多等因素，日本很难从提高资本、劳动要素供给等“量”的方面开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因此，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这一“质”的方面推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便成了日本恢复经济增长的重要政策方向。

全要素生产率反映了经济体对于资本、劳动等生产要素的使用效率，更合理的劳动和资本的组合方式将有助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其受到直接和间接两方面因素的影响：技术进步所带来的生产效率的提升是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直接因素；生产要素的组合配置效率则是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间接因素。日本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分别从这两方面同时着手，力图推动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

① 小林保美『サブライサイドの経済学』、多賀出版、1996年。

②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引领新常态》，《人民日报》2016年1月4日。

首先,日本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注重促进技术创新。技术创新是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直接因素,创造具有市场需求的技术创新可以直接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其次,日本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致力于改善经济的资源配置效率。这反映在以下两个层面:(1)重视推动产业转型与升级。产业的转型升级能够带来主导产业的合理转换,而主导产业的发展会带动经济整体的全要素生产率水平提升。(2)采用改善资源配置的相关政策,消除资源配置扭曲。在资本市场方面,促进市场竞争,打破行业垄断,提高投资效率,改革融资机制,促进资本流向更有效率的生产部门。在劳动力市场方面,通过深化雇佣方式改革,完善劳动力市场的制度建设,营造良好的劳动力市场运行秩序,改善劳动力供给的数量与质量,促进劳动要素流向更有效率的生产部门。

由上可见,日本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始终围绕着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展开,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成为日本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线。因此,日本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情况成为考察日本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政策实施效果的重要指标。接下来,将探讨日本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演进过程,深入分析日本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之间的关系。

三、日本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演进过程

日本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已有较长历史,最早可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分阶段来看,日本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20世纪70—80年代侧重于推动产业升级转型以及矫正资源配置扭曲,90年代以后主要是通过经济结构性改革提升资本、劳动等生产要素的使用效率,进入21世纪则致力于促进创新和提升全要素生产率。

(一) 20世纪70年代日本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政策

进入20世纪70年代,随着“尼克松冲击”以及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机的发生,日本经济所面临的内外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一方面,随着燃料价格的提高以及日元的持续升值,纺织、钢铁、一般机械、化学等行业出现萧条。另一方面,随着企业设备投资以及居民消费转向减少,经济增速从年均8%—10%逐渐下降至年均3%—4%,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宣告结束。为应对这一时期所出现的经济形势变化,日本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直接作用于企业或者说生产者的改革措施,试图通过去产能和发展新兴产业等方式,实现经济结

构转型，改善资源配置扭曲问题。这一时期日本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政策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针对“结构性萧条产业”实施“去产能”措施，提高资源使用效率。受经济形势变化的影响，日本的基础原材料、纺织产业的生产停滞不前，企业收益持续下降，出现了结构性萧条。为此，日本政府于1978年制定了《稳定特定萧条产业临时措施法》（简称“特安法”）^①，将平电炉、炼铝、合成纤维、造船等产业认定为“结构性萧条产业”。^②针对这些产业普遍存在的设备投资过剩、出口缩减、供需关系不匹配等问题，日本政府采取了“去产能”的政策措施，针对各产业制定过剩设备处理计划，推进过剩设备的废弃与冻结，推动企业组成卡特尔^③，实行生产、价格调整，以期减少库存、发挥企业生产经营转型的效果，进而达到恢复供需平衡、克服萧条的目的。截至1982年，日本政府指定的结构性萧条产业基本完成了设备处理目标，平均处理率为23%，处理目标达成率为95%。^④

第二，推动新兴产业发展，促进科技进步。在推动结构性萧条产业削减过剩产能的同时，日本政府采取提供开发补贴、增加政策性融资、实施特别折旧等方式，积极推动电子信息、核能发电、航空运输等新兴产业的发展。此外，日本政府还设立了产业技术审议会来主导产业技术的提升工作，采用注入国家资金、建设筑波科学城等办法，推动环境保护、新能源、电子信息、生物工程等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以带动日本经济的转型升级。

（二）20世纪80—90年代日本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政策

进入20世纪80年代，日本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政策实施重点从注重产业调整逐渐转向重视改善经济结构，经济政策不再直接作用于特定的产业。泡沫经济崩溃后，日本经济陷入长期低迷，日本政府采取积极的财政和货币政策，试图通过增加社会总需求来推动经济复苏，但这一凯恩斯主义政策的实施效果并不理想。从90年代中期开始，日本政府逐渐推行以“金融大爆炸”改革为代表的结构性改革政策，试图通过提高生产效率，

^① “特安法”的实施时间为1978年至1983年。

^② 通产省通商产业政策史编纂委员会《日本通商产业政策史》（第14卷），第14—15页。

^③ 日本政府允许因供需明显失调、商品价格降到平均生产成本以下的产业组织卡特尔，实施关于产量、销售量的限制。

^④ 通产省通商产业政策史编纂委员会《日本通商产业政策史》（第14卷），第35页。

从供给层面拉动经济增长。这一时期日本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继续推动产业调整和“去产能”工作。日本政府于1983年制定《改善特定产业结构临时措施法》，继续推动产业调整与过剩设备处理工作。^①除“特安法”早已确定的平电炉、炼铝等行业外，受第二次石油危机影响，石油化学工业也被日本政府认定为“结构性萧条产业”。根据这一法律，结构性萧条产业需制定“结构改善基本计划”，明确过剩设备处理目标及处理方式。1987年，日本政府又通过了《使产业结构平顺转换法》，以认定“特定设备”的方式，鼓励企业淘汰落后的生产设备，涉及钢铁、纺织、石油化工等多个产业。^②开展立法工作的同时，日本政府还设立了“特定产业信用基金”，从金融及财政层面推动企业实施过剩设备处理工作。截至1988年，日本共完成了平电炉238万吨、炼铝148万吨、石油化工378万吨的过剩设备处理任务。^③通过处理过剩产能，日本企业的资本收益率和生产效率均得到了较为明显的改善。

第二，积极推动科学技术创新。20世纪80年代，日本政府提出了“技术立国”口号，并采用诸多措施促进科学技术创新。包括：提高研发投入支出、促进国有研究实验设施建设、提倡多学科技术融合发展、推动国际研发合作、积极推动产业“知识集约化”、促进产业技术高附加值化，以及采用财政金融措施助推新材料、微电子以及生物工程等产业领域发展。

第三，推动日本经济结构改革。1996年桥本龙太郎上台执政，在日本经济增长陷入低迷的背景下提出了“六大改革”方案，即行政改革、经济结构改革、金融系统改革、社会保障结构改革、财政结构改革、教育改革等，试图通过实施这些改革，降低日本高企的生产成本，促进劳动、资本流动，促进创新，提高经济效率。

第四，实施规制改革。日本的规制改革始于20世纪80年代，日本政府取消了一系列限制性壁垒，促进了电信、铁道等部门的民营化进程，提升了经营效率。进入90年代，日本政府通过规制改革促进经济增长的意图愈发明显，将“规制缓和委员会”改制为“规制改革委员会”，旨在破除行业垄断、促进公平竞争。日本政府于1997年制定了《推进规制缓和计划》，计划在

① 岡崎哲二『通商産業政策史』（第3巻）、経済産業調査会、2012年、43頁。

② 同上书，第67页。

③ 同上书，第54—55页。

1995—1998 年间实施总计 5711 项的规制改革措施。^①

通过上述内容可见，20 世纪 80—90 年代日本政府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要目的在于提高经济资源的使用效率，推动经济增长。

（三）21 世纪初期小泉政府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措施

21 世纪初，小泉纯一郎上台执政，减少了 20 世纪 90 年代常用的总需求政策措施，开始实施经济的“结构性改革”，旨在提高日本经济的潜在增长率，推动日本的经济增长。具体来看，小泉政府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第一，金融系统改革。泡沫经济崩溃后，日本形成了规模庞大的不良债权，截至 2002 年，日本银行系统的不良债权总额已经占到银行贷款总额的 8.4%。^② 为解决银行系统的不良债权问题，日本政府采取了如下措施：严格检查银行资产，检查银行主要借贷对象的负债情况，督促银行解决不良债权问题，注入公共资金以增强银行系统稳定性等。通过这一系列的改革措施，显著减少了日本银行系统的不良债权，提升了日本金融系统的融资效率。

第二，邮政民营化改革。日本的邮政事业除了提供邮政服务外，还提供包括邮政储蓄、简易保险等在内的金融服务。通过邮政民营化改革，将市场机制引入邮政服务之中，一方面可以提高邮政行业的经营绩效，为消费者提供更好的服务，另一方面还可提升邮政储蓄资金的使用效率，为日本的金融系统改革和财政重建工作提供帮助。

第三，劳动力市场改革。为打破终身雇佣制对劳动力流动性的束缚，日本政府实施了劳动力市场改革，允许在所有行业中采用“劳动派遣”的方式雇用员工，由此增加了企业雇人的弹性和灵活度，提升了劳动要素的使用效率。

第四，设立结构改革特区。经济制度的改革通常会因前景的不确定性而面临诸多的阻力。对此，日本政府采用设立“结构改革特区”的方式，首先在特区内部实行新的法律法规，放松行业管制，借此观察政策的实施效果，总结成功经验和可行措施，从而为新政策的实施与推广提供扎实有

^① 李宏舟《日本规制改革问题研究：理论、内容与绩效》，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 年，第 53 页。

^② 星岳雄『何が日本の経済成長を止めたのか—再生への処方箋—』、日本経済新聞出版社、2013 年、71 頁。

效的依据。

（四）“安倍经济学”中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措施

2012年安倍晋三上台后，采用总需求与总供给相结合的方法，在增加总需求的基础上，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促进日本经济增长。但整体而言，“安倍经济学”最初提出的“三支箭”侧重于总需求政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政策仍显不足，“新三支箭”则旨在从供给层面加强经济政策措施，提振日本经济。

第一，“旧三支箭”侧重于从需求方面推动经济增长。2012年上台后，安倍政府推出了一系列经济刺激政策，被称为“安倍经济学”，主要由三方面组成。^①（1）大胆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采用量化与质化相结合的方式，增加货币供给，降低长短期利率，促进投资。（2）灵活的财政政策，在政府负债额已超过GDP百分之两百的情况下，继续加大政府投资规模。（3）着眼于促进民间投资的结构性改革政策，如倡导创立经济特区，吸引外国技术、人力资源和资金，让更多的女性工作等。总体而言，这“三支箭”主要侧重于采用积极的货币与财政政策来增加总需求，刺激经济增长，同时配合实施一定程度的供给侧改革政策。

第二，“新三支箭”侧重于从供给方面推动经济增长。经过两年多的政策实践，“安倍经济学”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日本经济增长，但未达到预期目标。安倍政府于2015年提出了被称为“新三支箭”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即打造强力经济、支持面向未来的生育计划、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并希望借此使日本的GDP于2020年达到600万亿日元。与“旧三支箭”不同，“新三支箭”着眼于从供给层面促进经济增长，并将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明确写入政策目标之中。如致力于从根本上改善创新环境，构建有利于创新的制度体系，通过实施创新来推动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2017年安倍政府还提出实施人才革命及生产力革命，从而实现“一亿总活跃社会”的目标。^②

通过对日本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历史的考察可以发现，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始终是日本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线，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这一政策目标贯穿于日本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实施全程。

^① 张季风 《“安倍经济学”给日本带来什么》，《领导科学论坛》2016年第8期。

^② 王新生 《安倍长期执政的原因探析：社会变迁、制度设计、“安倍经济学”》，《日本学刊》2018年第3期。

四、实证检验

由上述分析可知，全要素生产率的进步可作为评价日本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施效果的重要指标。因而，本文将使用时间序列方法，检验日本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实施是否有效促进了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并借此来评价日本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实施效果。

（一）模型的建立

全要素生产率受到直接和间接两方面因素的影响。技术进步所带来的生产效率提升是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直接因素，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则是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间接因素。为此，本文选取以下变量来分析日本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其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第一，研发费用。研发费用是研究开发投入在数量上的表征，研发费用的增加有利于技术水平的提升。有效的供给侧改革政策将带动研发费用的增加，从而促进创新，提高技术水平。第二，产业结构合理化指标。通过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能够清除抑制生产资料流动的障碍，纠正资源错配，提高资源使用效率，拉动全要素生产率的生长。泰尔指数作为衡量产业结构合理化的常用指标，可用以反映资源的有效利用程度。^① 第三，产业结构升级指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实施有助于促进经济体的产业升级。主导产业的有效转换是产业结构升级的主要动力，可以通过产业间的波及效应促进经济体生产效率的提高。

根据前述分析，本文将研发费用、产业结构合理化指标以及产业结构升级指标作为自变量，全要素生产率（TFP）作为因变量，模型的设定形式如下：

$$TFP_t = \beta_1 RD_{t-1} + \beta_2 TL_t + \beta_3 TS_t \quad (1)$$

其中，RD 为研发费用，TL 为产业结构合理化指标，TS 为产业结构升级指标。t 表示时间，t-1 表示一期滞后。为消除异方差，对式（1）取对数后得到：

$$\ln TFP_t = \gamma_1 \ln RD_{t-1} + \gamma_2 \ln TL_t + \gamma_3 \ln TS_t \quad (2)$$

式（2）为本文的基本回归模型。根据式（2）可计算出各影响因素的弹

^① 干春晖、郑若谷、余典范 《中国产业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和波动的影响》，《经济研究》2011年第5期。

性系数。研发费用、产业结构合理化指标以及产业结构升级指标每提高1%，将分别带动TFP增长 γ_1 、 γ_2 和 γ_3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通过作用于研发费用、产业结构合理化、产业结构升级等经济变量，起促进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作用。

(二) 数据说明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来自日本经济产业研究所的数据库JIP Database 2015^①及野村浩二相关研究^②的测算结果，分析的时间段选取1973年至2012年。

1. 日本全要素生产率

野村浩二通过测算资本、劳动、能源、原材料的投入，计算得出了日本1955年至2004年间的全要素生产率数据。^③本文以此为基准，将之作为因变量进行回归分析。

2. 研发费用

日本研发费用的数据来自日本文部科学省的《科学技术统计》。

3. 产业结构合理化指标

本文将泰尔指数作为衡量产业结构合理化的度量指标。^④泰尔指数的定义如下：

$$TL = \sum_{i=1}^n \left(\frac{Y_i}{Y} \right) \ln \left(\frac{Y_i}{L_i} / \frac{Y}{L} \right) \quad (3)$$

式(3)中，TL表示泰尔指数，Y表示产值，L表示就业人口，i表示产业，n表示产业部门数，本文的产业部门数为3。新古典经济学派指出，当经济处于均衡状态时，各产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应与经济总体的劳动生产率保持一致，即 $Y_i/L_i = Y/L$ ，从而 $TL=0$ 。因此，TL值越接近零，表明产业间的资源分配越均衡，产业结构安排越合理。反之，TL值越偏离零，则说明经济体的产业结构越不合理，资源错配的程度越严重。即，TL值越趋近于零，资源分配越有效率，全要素生产率的水平也就越高。由此可知，全要素生产率水平与TL值之间存在反向关系，TL值越低则全要素生产率水平越高。本文基于JIP Database 2015计算得出日本的产业结构合理化指标。

① 经济产业研究所「JIP Database 2015」、[https://www.rieti.go.jp/en/database/JIP2015/\[2018-09-10\]](https://www.rieti.go.jp/en/database/JIP2015/[2018-09-10])。

② 本文依照野村浩二(2004年)的测算方法，将日本全要素生产率的数据扩展至2012年。

③ 野村浩二『資本の測定—日本経済の資本深化と生産性—』、慶應義塾大学出版会、2004年。

④ Theil H. and Uribe P., “The Information Approach to the Aggregation of Input-output Tables”, *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1967, pp. 451-62.

4. 产业结构升级指标

产业结构升级指标主要度量经济体产业升级的程度。根据克拉克定律，随着经济发展，非农产值占经济的比重逐渐提高。战后日本也经历了农业产值占比大幅下降、非农产值占比大幅提高的发展过程，但本文的分析时间段主要集中于日本完成工业化的 20 世纪 70 年代之后，这一时期日本产业结构的突出变化是“经济服务化”，服务业产值的增长率快于制造业。因此，本文使用第三产业产值与第二产业产值的比重作为产业结构升级的度量指标，定义如下：

$$TS = \frac{Y_3}{Y_2} \quad (4)$$

其中，TS 表示产业结构升级指标， Y_3 表示第三产业， Y_2 表示第二产业。根据理论部分分析，产业结构升级指标的提高，会促进产业升级，而产业升级有助于推动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因此，产业结构升级指标与全要素生产率水平之间存在正向关系，可以预期产业结构升级指标的提高，将推动全要素生产率水平上升。本文根据 JIP Database 2015 计算得出日本的产业结构升级指标。

(三) 实证分析

1. ADF 单位根检验

由于本文使用时间序列的分析方法，有必要对经济变量的平稳性进行检验，因为经济变量的不平稳性会导致经典假设条件无法得到满足，系数估计会产生误差。对于平稳的经济变量，可直接使用最小二乘法（OLS）进行分析。对于非平稳变量，根据格兰杰（Granger）定理，若经济变量本身不平稳，但经过一阶差分后平稳，即变量均为一阶单整，在检验变量之间协整关系的基础之上，仍然可以进行 OLS 分析，从而揭示出变量间的长期关系。本文依照上述理论，分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日本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路径。

本文使用 ADF（增广的 Dickey-Fuller）单位根检验法，验证经济变量的平稳性，所得结果如表 1 所示。

其中， $\ln TFP$ 表示全要素生产率的对数值， $\ln RD$ 为研发费用的对数值， $\ln TL$ 为产业结构合理化指标的对数值， $\ln TS$ 为产业结构升级指标的对数值。由表 1 可知，全要素生产率、研发费用、产业结构合理化指标、产业结构升级指标等经济变量的水平序列都无法在 0.05 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单位根

表1 单位根检验结果

经济变量	ADF 检验形式	ADF 统计量	P 值	结论
lnTFP	(C, T, 9)	-0.404	0.984	I (1)
lnRD	(C, T, 9)	-2.031	0.565	I (1)
lnTL	(C, T, 9)	-1.047	0.925	I (1)
lnTS	(C, T, 9)	-2.423	0.363	I (1)
Δ lnTFP	(C, 0, 9)	-2.838	0.006	I (0)
Δ lnRD	(0, 0, 9)	-2.586	0.011	I (0)
Δ lnTL	(0, 0, 9)	-6.304	0.000	I (0)
Δ lnTS	(0, 0, 9)	-5.442	0.000	I (0)

注: ADF 检验形式为 (C, T, k), 分别表示截距项、趋势项以及滞后阶数, 存在则记为 C、T, 否则记为 0; Δ 表示一阶差分。

检验, 但是这些经济变量的一阶差分序列都是平稳变量。因此, 可以认定 lnTFP、lnRD、lnTL 以及 lnTS 均为一阶单整序列, 可能存在长期均衡关系。

2. Johansen 协整关系检验

若经济变量均为一阶单整序列, 则这些经济变量之间可能存在协整关系, 使其线性组合的残差平稳。本文使用 Johansen 协整检验, 验证这些经济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本文首先建立了一个滞后阶数为 4 的无约束向量自回归模型 (VAR), 并根据 LR、FPE、AIC、SC 以及 HQ 等信息准则判断 VAR 模型的最优滞后阶数。如表 2 所示, FPE、AIC 以及 HQ 等信息准则显示 VAR 模型的最优滞后阶数为 4, 因此 Johansen 协整检验的最优滞后区间应为 1 至 3。

表2 无约束向量自回归模型最优滞后阶数检验

滞后长度	LogL	LR	FPE	AIC	SC	HQ
0	131.885	NA	7.88e-09	-7.308	-7.129	-7.246
1	341.104	358.662*	1.27e-13	-18.349	-17.460*	-18.042
2	356.708	23.184	1.35e-13	-18.326	-16.726	-17.774
3	377.121	25.661	1.17e-13	-18.578	-16.268	-17.781
4	402.190	25.785	8.55e-14*	-19.097*	-16.075	-18.053*

注: * 表示在 5% 的置信水平上拒绝原假设。

表 3 报告了以 1 至 3 为协整滞后区间，无截距无线性趋势形式的 Johansen 协整检验结果。

表 3 Johansen 协整检验结果

特征值	迹统计量	5%的临界水平值	协整的原假设	检验结果
0.598	63.401	40.175	$r=0$	None ***
0.505	31.527	24.276	$r \leq 1$	Atmost1 **
0.152	6.899	12.321	$r \leq 2$	Atmost2
0.032	1.129	4.129	$r \leq 3$	Atmost3

注：*** 表示在 99%的置信水平上拒绝原假设；** 表示在 95%的置信水平上拒绝原假设。

从 Johansen 协整检验的结果看，全要素生产率、研发费用、产业结构合理化指标、产业结构升级指标等经济变量之间，至少存在两个协整关系，表明全要素生产率水平与研发费用、产业结构合理化指标、产业结构升级指标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本文通过使用时间序列模型中的动态滞后模型分析四者的协整关系，揭示其长期均衡关系的具体表现形式。

3. 协整估计结果

本文运用时间序列的分析方法，采用动态滞后模型对影响日本全要素生产率的因素进行了回归分析，所得结果如表 4 所示。

表 4 协整估计结果

	lnTFP		
	1973—2012	1973—1990	1991—2012
C	-1.179 *** (-6.707)		
$\ln RD_{t-1}$	0.148 *** (9.271)	0.0515 (0.648)	0.056 *** (11.378)
$\ln TL$	-0.129 *** (-6.791)	-0.242 * * (-2.778)	-0.091 * * (-3.052)
$\ln TS$	-0.215 *** (-4.569)	0.401 * (2.163)	-0.117 * (-2.216)
R^2	0.993	0.995	0.895
D. W.	1.816	2.018	2.012

注：***、**、* 分别表示在 1%、5%和 10%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括号内的数值为估计系数所对应的 t 统计量。

由表4可知,在1973年至2012年的区间内,研发费用的一阶滞后以及产业结构合理化指标、产业结构升级指标对全要素生产率有显著影响。在所分析的三个时间段内,模型的拟合程度较好,且D.W.值都接近于2,表明残差不存在自相关,符合假设条件。总体上看,动态滞后模型的回归结果较好地揭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日本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展示了全要素生产率、研发费用、产业结构合理化指标与产业结构升级指标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

(四) 实证结果分析

首先,在日本完成工业化后的1973年至2012年这一时间段内,研发费用、产业结构合理化指标的提高对日本的全要素生产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研发投入每提高1%,会促进全要素生产率提高14.8%;产业结构合理化指标每下降1%,全要素生产率会提高12.9%。但是,产业结构升级指标的系数与预期相反,产业结构升级指标每提高1%,会导致全要素生产率下降21.5%。这说明在后工业化时期,日本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要通过促进创新、改善资源配置两个路径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产生了积极效果,促进了日本的技术水平以及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进而提升了全要素生产率。虽然日本经济结构日趋服务化,产业升级程度不断提高,但由于服务业生产率进步较慢,导致产业升级对提升日本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不甚明显。

其次,在泡沫经济崩溃之前的1973年至1990年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日本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表现出与整个时间段不同的影响路径。在这一时期,日本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要通过改善产业结构合理性以及推动产业结构升级两个路径来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产业结构合理化指标每下降1%,全要素生产率会提高24.2%;产业结构升级指标每提高1%,会推动全要素生产率提高40.1%。在泡沫经济崩溃之前,日本主要通过实施产业政策、制定特定萧条产业法规等措施,来逐步淘汰夕阳产业,消除过剩产能,推动产业结构改革。从高速增长时期的以钢铁、化学为主的重化工业产业向以组装加工为主的汽车、电子机械制造业转型,实现了主导产业的有序转换,有效推动了产业升级。此外,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还实施了三大国企,即国铁、电电公社(NTT)以及专卖公社的民营化,改善了企业经营效率,促进了资源的有效配置。简言之,泡沫经济崩溃前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改善了日本的产业结构,推动了日本的产业升级,从而使得日本的产业结构合理化程度上升,

产业升级加快,促进了全要素生产率水平的提升。而由于这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措施主要集中于改善产业结构、调整资源配置方面,在促进企业研发投入方面的措施较少,从而使得这一时期供给侧改革对促进创新的作用并不明显。

再次,在泡沫经济崩溃后,日本经济陷入长期低迷,迫使日本采取了一系列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措施,以恢复经济增长。1990年至2012年间,日本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要通过促进创新、改善产业结构合理性等两方面来推动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在20世纪90年代,桥本龙太郎首相推出了六大改革,尤其是放松了对金融资源配置的管制;进入21世纪,小泉政权又推出结构改革政策,实行了劳动力市场的改革。实证结果显示,在此期间,研发投入每提高1%,促进全要素生产率改善5.6%;产业结构合理化指标每下降1%,促进全要素生产率提升11.7%。这表明,日本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改善了资本、劳动等生产资源的配置,提高了资源的使用效率,促进了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此外,通过结构性改革,激发了民营经济的活力,推动了私人企业的研发投入,从而促进了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但是需要注意,产业结构升级指标不仅没有促进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反而起了反作用,表明随着日本经济结构服务化的发展,日本服务业的生产率没能跟随经济结构的变化而相应提高,日本的服务业生产率问题亟须解决。

五、日本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经验与启示

日本自20世纪70年代就开始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政策,具有较长的改革实践经历,而且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其政策具有不同的特点,包括政策目标、方法手段以及实施效果等均有不同。分析与借鉴日本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施的经验与教训,从中提取有效的政策路径与手段,或有益于现阶段中国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一) 日本的经验

在经济供需结构发生变化、结构性问题日益突出的背景下,日本开始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日本经济陷入长期低迷之后,日本政府进一步推动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实施。纵观日本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发展,其最重要的特征是始终围绕着提高全要素生产

率这一目标展开。

日本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政策的实施存在阶段性变化。20世纪70年代中期至80年代中期,日本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其产业政策的一个延伸,着重对过剩产能进行处理,目的在于消除产业的过剩产能,促进供需关系恢复平衡,提高有效供给。这些措施提高了日本经济资源的使用效率,推动了其经济增长。这是日本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第一个阶段。80年代中期至今是日本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第二个阶段。这一阶段的主要特征在于,政策调整的重点逐步倾向于构建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改革日本既有的经济制度,提高经济的运行效率,激发市场主体的创新活力。一系列措施不仅促进了日本企业的技术创新,而且提高了经济体各项资源的使用效率,以促进日本经济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形式表现出来。

具体而言,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的供给侧政策,注重产业调整,通过“去产能”等措施提高资源使用效率,同时注重培育新兴产业发展,顺利地实现了产业的转型升级,完成了主导产业的有序转换。通过这些方式,改善了资源配置扭曲,推动了科学技术进步,提升了日本的全要素生产率。90年代以及新世纪的结构性改革措施则侧重于通过实施规制改革等措施,改善日本的经济制度,消除资源配置扭曲,减少限制要素流动的障碍,提高要素配置效率,从而解决资源使用效率低的问题。这一时期,日本大力推动金融体系改革,处理银行体系的不良债权以及僵尸企业问题,促进资本流向具有高生产率的产业部门。此外,日本政府还推动雇佣方式改革,调整传统的终身雇佣制,促进劳动力流动,从而提高劳动要素的使用效率,助力日本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近期的“安倍经济学”,综合使用总需求政策与总供给政策,在通过灵活的财政政策、量质并举的货币政策提高经济总需求的同时,着重推动创新发展和劳动要素供给,致力于劳动方式改革,促进女性与老年人口就业,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促进日本经济发展。

(二) 对中国的启示

当前,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处于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关键时期,面临着资本收益率下降、人口老龄化趋势加剧等一系列问题,因而需要持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破除抑制资源流动的障碍,推动自主创新研发,实现经济增长从要素驱动向全要素生产率驱动的转化。为此,中国应积极吸取日本的经验与

教训, 注重提升全要素生产率, 在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政策时应考虑以下几点。

其一,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需要供给侧与需求侧政策共同发力。供给侧改革的推行需要良好的宏观经济运行状况, 通过总需求政策的实施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实施创造良好的宏观经济环境, 便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实施。1996年, 桥本龙太郎内阁由于过分乐观地估计了当时的经济形势, 在日本经济处于下行期时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导致改革进程受阻, 抑制了日本经济效率的提升。与此相反, 安倍内阁自上台以来, 通过推行宽松的货币、财政政策, 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实施提供了良好的宏观经济基础, 有利于其进一步推行创新、雇佣改革等政策。因此, 中国在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时, 也应辅以适当的货币、财政政策, 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实施提供有利的经济环境基础。

其二, 积极推动经济增长动能转换, 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日本在完成工业化进程后, 经济的结构性问题日益突出, 潜在增长率持续下降, 对此日本采取了一系列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措施, 推动技术革新和产业升级。20世纪90年代以后, 日本经济陷入长期低迷, 日本政府进一步推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改革日本的经济制度, 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 助推产业技术发展和革新, 以提升经济的全要素生产率。由日本的经验可知, 当经济处于增长动能转换期时, 通过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是一种可行的政策措施。当前中国正处于经济增长动能调整的关键时期, 中国经济的增长动能正在从要素驱动向全要素生产率驱动转换。中国应吸取日本的经验, 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提升全要素生产率, 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其三, 从根本上改善创新环境, 推动技术创新。从日本的经验看, 日本始终重视技术创新, 20世纪70—80年代就采取了财政金融补贴措施来助力企业技术改造升级。安倍政府上台以来, 依旧致力于改善创新环境, 为企业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 推进科学技术的研究开发。近年来, 中国的科学技术水平与世界前沿的差距不断缩小, 通过实施创新、提高技术水平是中国实现技术水平进步的最根本保障。随着中国经济所面临的外部形势发生变化, 通过技术引进带来技术进步的空间不断缩小, 在这种情况下自主创新成为科学技术水平提升的必经之路。自主创新的提升有赖于各市场经济主体,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实施可以改善创新的制度环境和资源的使用

效率，从而推动自主创新，提高中国的科学技术水平。为此，中国应通过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企业提供良好的创新环境，促进创新的实施与推进。

其四，推动产业结构升级转型，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20世纪70年代中期，日本完成工业化后，积极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实现了经济结构从“厚重长大”向“短小轻薄”的转换，主导产业从以钢铁、化学产业为代表的重化工业转变成以汽车、电子机械为代表的加工组装工业，维持了日本经济的持续增长。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90年代后，日本产业结构转型步伐缓慢，信息技术产业发展滞后，迟迟没有形成新的支柱产业，阻碍了日本经济增长。中国应吸取日本的经验和教训，持续优化产业结构，促进产业转型，以推动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一方面，要加快制造业的升级转换，推动中国的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从中端向高端转化。另一方面，要提升中国的产业结构，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加快互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等先进科学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提高经济的供给质量。

其五，改变资源配置扭曲问题，提高要素使用效率。日本政府始终重视提高要素配置效率，20世纪70年代实施了针对“结构性萧条产业”的“去产能”措施，90年代后则侧重实施“规制改革”，消除抑制经济资源流动的障碍，降低产业的准入门槛，提高要素使用效率。中国在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过程中，同样应注重改善资本、劳动等要素资源的配置扭曲，提高劳动、资本等生产要素的使用效率，提高要素市场的流动性，从而推动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

纵观日本完成工业化后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施历程可以发现，日本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走过了从注重宏观层面调控转向激发微观市场活力的过程。中国自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来，在消除过剩产能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效果，资源的使用效率也有所提升，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发展。借鉴日本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实施经验，今后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应放在提高各类市场活动主体的自主创新活力方面，促进企业自主技术创新，提高科学技术水平，促进中国经济的可持续高质量增长。

The Path of Supply-side Structural Reform: Japan's Experience and Inspiration

Tian Zheng and Wu Peng

Since the completion of the industrialization process in Japan, the structural problems of the Japanese economy have become even more severe. Insufficient aggregate demand, the decline of capital rewards, and the aging population problems have jointly led to a decline in potential productivity in Japan, hindering to the sustained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Japan. Japan began to implement supply-side structural reforms in the mid-1970s with the aim of eliminating resource mismatches, improving industrial structures, and promoting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Reviewing the development history of Japan's supply-side structural reforms, it can be discovered that the reforms have promoted the Japanese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China can learn from Japan's experience and take the promotion of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as the policy orientation of the current supply-side structural reform.

サプライサイド構造改革の道筋

—日本の経験と示唆—

田 正 武 鵬

日本は工業化を実現した後、経済の構造的な問題が顕著になってきた。総需要の不足、資本収益率の低下及び人口の高齢化などの問題により、日本経済の潜在的生産率は低下し、持続的で健全な経済発展を阻害した。日本は1970年代半ばからサプライサイド構造改革を実施し始めたが、それはイノベーションの促進、生産要素のミスマッチの解消、産業構造の改善、全要素の生産性の向上などを目的とするものであった。日本のサプライサイド構造改革の歴史を振り返り、併せて時系列分析の方法を用いて、日本のサプライサイド構造改革の実施が全要素の生産性向上に与えた効果を検証した。中国は日本の経験から学び、全要素の生産性の向上をサプライサイド構造改革の政策の突破口、主要な焦点とする。

(责任编辑：叶琳)